

蜀藏叢書

1957

第一冊

1957

巴蜀珍稀教育文獻

主編

鍾振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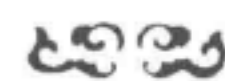
成都時代出版社



蜀藏叢書



第一冊



巴蜀珍稀教育文獻匯刊

主編 李勇先 高志剛

成都時代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巴蜀珍稀教育文獻匯刊：全46冊 / 李勇先，高志剛主編。
—成都：成都時代出版社，2014.6
(蜀藏)

ISBN 978-7-5464-1184-2

I. ①巴… II. ①李… ②高… III. ①地方教育—古籍—匯編—四川省 IV. ①G527.7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資料核字(2014)第 137999 號

巴蜀珍稀教育文獻匯刊

主編	李勇先 高志剛
出品人	石碧川
責任編輯	蔣雪梅
責任校對	李茜蕾
責任印製	于燕飛
裝幀設計	墨創文化
出版發行	成都時代出版社
電話	(028) 86742352 (編輯部) (028) 86615250 (發行部)
網址	www.chengdusd.com
印刷	南京工大印務有限公司
規格	889mm×1194mm 1/16
印張	1437.5
字數	8900千
版次	2016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5464-1184-2
定價	叁萬玖仟圓(全肆拾陸冊)

著作權所有 違者必究

本書若出現印裝品質問題，請與工廠聯繫。電話：025-84179011

ISBN 978-7-5464-1184-2



9 787546 411842 >

《蜀藏》學術委員會

主任

胡昭曦 四川省首批學術帶頭人、四川省中華文化學會副會長、原四川大學圖書館館長、四川大學歷史文化(旅遊)學院教授

葛劍雄 全國政協常委、原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譚繼和 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四川省歷史學會會長、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霍 巍 長江學者、四川大學博物館館長、四川大學歷史文化(旅遊)學院院長、教授

副主任(按姓氏筆劃排序)

李 剛 中國宗教學會副會長、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原所長

姚樂野 四川大學社會科學處處長、中國西部邊疆安全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秘書長兼文獻中心主任、教授

馬曉彬 四川省地方志學會會長、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主任

高志剛 四川省地方志學會副會長、成都市地方志學會會長、成都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主任

蔡方鹿 四川省中國哲學史研究會名譽會長、中華朱子學會副會長、四川省朱熹研究會會長、四川師範大學政政學院教授

黎小龍 重慶歷史學會會長、重慶巴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原西南大學副校長、教授

委員（按姓氏筆劃排序）

毛麗婭 四川省中國哲學史研究會常務理事、四川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教授

文安邦 四川省地理學會理事長、中國科學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災害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王毅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成都博物院院長、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館長

王家球 成都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

王嘉陵 四川省圖書館副館長、李劫人研究學會副會長

祁和暉 西南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

吳松弟 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主任、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李誠 四川師範大學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四川師範大學漢語國際教育中心常務副主任、教授

李孝聰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李勇先 四川省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主任、中國范仲淹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四川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

李德英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旅遊)學院副院長、教授

林平 四川大學圖書館副館長、教授

段渝 中國西南民族研究學會副會長、四川省民族學會副會長、四川師範大學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胡建強 成都圖書館館長、研究員

韋方強 原四川省地理學會理事長、中國科學院成都山地災害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粟品孝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旅遊)學院教授

殷煥舉 四川農業大學政治學院院長、教授

殷夢霞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社長

馬強 重慶市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高大倫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研究員

張世均 西南民族大學旅遊與歷史文化學院副院長、教授

郭聲波 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副主任、暨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陳廷湘 四川大學西南文獻中心主任、四川大學歷史文化(旅遊)學院教授

彭邦明 四川省圖書館古籍特藏部主任、研究員

黃忠彩 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會秘書長、中國西部邊疆安全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副主任

楊文華 成都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資料信息處處長、總編室主任

劉復生 中國宋史學會副會長、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四川大學歷史文化(旅遊)學院教授

潘殊閑 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地方文化資源保護與開發研究中心主任、西華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教授

蔡東洲 四川省區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西華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教授

謝元魯 四川省人民政府參事、四川省歷史學會副會長、四川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教授

藍 勇 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副主任、西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教授

《蜀藏》編纂委員會

主編

李勇先 高志剛

副主編

毛麗婭 王家球 楊文華 金鵬

編委（按姓氏筆劃排序）

伍磊	成佳	成功偉	宋敏	李榮慧	李聞傑	沈紅心	姜莉
孫振中	高宇	張保見	張冬梅	張輝輝	陳晨	華禮嫻	覃影
黃小華	楊敏	楊向飛	鄒豔	謝乾	顏姚煒	羅凱	竇浩玉

《蜀藏》出版工作委員會

主任

石碧川

副主任

李文凱 曾紹東 蔣雪梅 丁大銳 袁文

編委（按姓氏筆劃排列）

王忠 王相海 侯躍生 紀昌權 張小蘭 陳建華 黃艷 解學馳
劉立玲 魏永銀 龔愛萍

前言

巴蜀歷史源遠流長，巴蜀文化絢麗璀璨。作為中華文明發祥地之一的巴蜀大地，歷經數千年風雨滄桑，一代又一代巴蜀人筆路藍縷，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創造了輝煌燦爛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形成了博大精深、瑰麗多姿的巴蜀文化。

一、巴蜀歷史源遠流長

巴蜀既是一個地域概念，又是一個文化概念，包含了地、人、族、國、文化等豐富內涵。

從地域範圍來看，今重慶市和四川省古稱巴蜀〔一〕，在《禹貢》為梁州之域〔二〕。公元前三一六年，秦滅蜀國和巴國，在其地設立蜀郡和巴郡，「巴」、「蜀」從國名變成地名。今四川地區別稱蜀，重慶地區別稱巴。自此以後，巴郡和蜀郡成為川東、川西兩大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巴、蜀也一直作為川東、川西地域、人群和文化的代稱。

西漢武帝時，積極開拓西南邊疆，設益州刺史部，故四川又稱益州。東漢時仍稱益州。三國時，劉備在四川建立蜀漢政權，故四川又稱蜀或蜀漢。西晉時，四川分為梁、益二州。東晉時，四川已有「蜀川」之稱〔三〕。

唐太宗貞觀元年，改益州為劍南道，梁州為山南道〔四〕。唐玄宗開元二十二年，分山南道為山南東道、

山南西道。唐肅宗至德二年，改蜀郡為成都府，分劍南道為東、西兩川〔五〕，置劍南東川和劍南西川兩節度使，治所分別在今梓州和成都，於是四川就有了「兩川」之稱。廣德元年，復併劍南東川、劍南西川為一節度。唐代宗時，將劍南東川、劍南西川、山南西道等三道置三道節度使，又稱三川節度使，或簡稱「劍南三川」，從此四川又有了「三川」之稱〔六〕。宋太祖乾德三年平蜀，置西川路。開寶六年，分置峽西路〔七〕。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合併為川峽路。宋真宗咸平四年，又分西川路為東、西兩路〔八〕，分峽西路為利、夔兩路，統稱益、梓、利、夔四州路，治所分別為今成都、三臺、漢中和奉節，一般稱為「川峽四路」〔九〕，又總稱為四川路，後遂省文，簡稱「四川」〔一〇〕，從此正式有了「四川」之名。宋徽宗大觀二年詔書中正式使用「四川」這一稱謂〔一一〕，這是目前所見到的將「四川」作為行政區劃略稱的開始。在這以後，宋代設有「四川宣撫使」、「四川制置使」、「四川轉運使」等官職〔一二〕。

四川稱省，始於元代。元世祖至元七年設置中央行政機構——中書省，全國普遍建行省，是僅次於中央的地方行政機構。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在宋代川峽四路基礎上正式設置四川行中書省，又稱四川行省，簡稱四川省，省會設在成都。從此，四川始有稱省之名〔一三〕。明太祖洪武九年，將四川行中書省改為四川承宣佈政使司〔一四〕。清世祖順治二年，又恢復四川行省，簡稱四川省〔一五〕。此後四川省的名稱就一直沿用下來。一九九八年三月我國進行行政區劃調整，正式將原四川省分為重慶直轄市和四川省兩個行政區域。

從自然地理區劃來看，巴位於四川盆地東部，蜀位於四川盆地西部和中部。而在歷史上，巴蜀地域範圍并非一成不變。如巴作為地域、民族和古國的名稱，早在夏商時代就已出現，并見於《山海經》、《尚書》等先秦文獻中，古巴人世代生息繁衍於北起陝南、漢中，南至黔中、湘西、東至川東、鄂西，西至嘉陵江、漢水上游這一廣闊區域內。至於蜀，其地域範圍也相當遼闊，它以成都平原為中心，大致包括四川盆地西部平原和漢中平原等地。相傳居住在岷江上游蜀山的蜀山氏曾與黃帝族群通婚，其子孫世代分封於

蜀。從商、周直到春秋、戰國，古蜀國先後經歷了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等幾次王權更迭。

作為原古蜀國都城的成都自秦漢以來一直是我國西南政治、經濟、文化重鎮和長江上游古文明中心。秦漢時期，成都是全國著名的織錦業中心。唐宋時期，成都經濟發達，商業繁榮，有「揚一益二」之稱。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曾來到這座花團錦簇、令他驚歎不已的「錦繡之城」，看到錦江中「船舶舟楫如蟻，運載着大宗的商品」，讚歎「這是一座美麗的城市」，作為一個外國人，親眼見證了成都城市的開放與商業的繁榮盛況。中國道教起源於成都，舉世聞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充分利用自然條件，因勢利導，興利除害，使成都平原沃野千里，號曰「天府」。漢初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創辦石室講堂，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所由地方政府創辦的高等學校，其辦學的成功經驗被漢武帝推向全國，「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一六〕。北宋成都出現了用於商品交換的貨幣——「交子」，這是世界上第一張真正意義上的紙幣。近代中國新教育制度奠基人、四川學政提督張之洞在成都創辦尊經書院，為我國近代新式教育樹立了典範。成都還是古代南方絲綢之路的起點，從先秦開始，成都在我國西北絲綢之路開闢之前就與亞歐大陸建立了密切的商貿聯繫，這可從廣漢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的大量象牙、海貝、金杖、金面具等得到充分證明。漢武帝時，張騫在大夏發現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說明成都到印度再到西亞早就有一條對外開放和交流的通道，使成都衝破了「蜀道難」的地域限制。如今當更加開放的四川正向世界敞開胸懷的時候，我們仿佛還能依稀聽到南方絲路上馬幫和商旅們留下的艱難跋涉的足音。

二、巴蜀文化絢麗璀璨

有着悠久歷史和鮮明地域特色的巴蜀文化，與齊魯文化、中原文化、吳越文化、湖湘文化、秦隴文化、

嶺南文化等地域文化一樣，是整個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相互交流，彼此汲取影響，共同促進了中華文化的發展。

巴蜀文化是歷代巴蜀人所創造的所有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和，其中支撐和浸潤巴蜀文化的則是以經學、文學、史學為代表的「蜀學」〔一七〕，它萌芽於先秦，初興於漢初，傳承於蜀漢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繁盛於兩宋，復興於晚清，以自成體系、特色鮮明、富瞻博奧、開放大氣、極富進取與創造力屹立于中華民族地域文化之林。

西漢初，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設石室講堂，招收「學官弟子」，從此蜀地民智大開，「學徒麟萃」〔一八〕，成為巴蜀地區教育與文化事業的壯舉，故當時就有「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一九〕，「於是蜀學比於齊魯」〔二〇〕，「蜀學」之名也始見於此，巴蜀地區因此成為當時全國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湧現了「以文辭顯於世，文章冠天下」的蜀中漢賦四大家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嚴君平、揚雄、資中王褒，他們還在黃老學、文字學、訓詁學、經學等領域取得了重要成就。

東漢魏晉時期，巴蜀地區仍然是全國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尤其在經學和史學領域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就。如東漢時期，巴蜀經學有了長足發展，著名巴蜀經學家如雒人段恭、蔡弓、梓潼景鸞、成都柳宗、張楷、繁人任末、涪人王晏、廣漢張昌、新都段翳、楊厚、綿竹董扶、任安等皆當時通經學古之士，他們或游歷拜師，或講學授徒，有力地促進了經學在巴蜀地區的傳播。兩晉南北朝時期，巴蜀經學開始向多元化方向發展。在史學方面，我國方志之作萌芽於春秋，當時已有「四方之志」〔二一〕、「邦國之志」〔二二〕。相傳孔子見「百二十國寶書」〔二三〕，實為方志之權輿，而巴蜀編史修志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兩漢時期，各地方志見於記載的多達一百多種，或記述方國歷史，或記載州郡地理，或敘論鄉黨耆舊，而益州地區撰述之風尤盛，如《蜀本紀》、《本蜀論》、《蜀後志》等歷史之書，《巴蜀耆舊傳》、《益部耆舊傳》等人物志。

這些著作的問世，為更加成熟的方志撰述創造了良好條件。蜀漢末西晉初，巴西郡安漢人陳壽著《三國志》，成為我國四大良史之一。東晉江原人常璩鑒於之前志書將歷史、地理、人物三者分離、各寫一面的缺陷，綜合各家方志的優點，並吸取《史記》、《漢書》等紀傳體史書的長處，創造性地將歷史、地理、人物和地理志、編年史、人物傳記等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在充分吸收前人如來敏《本蜀論》、常寬《蜀後志》、《巴蜀耆舊傳》、《益部耆舊傳》等史志成果的基礎上，寫出了《華陽國志》這部規模宏大、內容廣博、體例簡括、取材精審的著作，它是我國隋以前古方志中碩果僅存者，也因此成為一部「傳諸不朽，見美來裔」、實開方志之先河的歷史巨著，被譽為「中國方志之王」〔二四〕。巴蜀史學，有「隋前存書有二（按：《三國志》和《華陽國志》），唐後莫隆於蜀」〔二五〕之美稱，從中可見巴蜀史志發達是這一時期巴蜀文化的一大特色。

到了宋代，蜀學昌盛，巴蜀文化在兩漢以後又迎來了一個新的發展高峰。北宋學者呂陶說：「蜀學之盛，冠天下而垂無窮。」〔二六〕南宋井研人李心傳也說：「郡國之學，最盛於成都。」〔二七〕元代學者仁壽虞集也說：「吾蜀文學之盛，自先漢至於唐宋，……非它州之所能及。」〔二八〕巴蜀學術在這一時期無論在經學、史學、文學等領域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

中國歷史上七次鐫刻石經（即刻在石頭上的儒家經典），其中以五代後蜀孟昶廣政元年至北宋徽宗宣和六年歷時一百八十七年所刻的蜀石經（通稱《廣政石經》、《孟蜀石經》）以其書法俊美、完整保存了全部十三經經文及大量經文注釋備受歷代學者尊崇，堪稱中國古代文教史上的壯舉，對巴蜀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在思想學術領域，以眉山蘇洵、蘇軾、蘇轍父子為代表的「蜀學」與程頤、程顥的「洛學」和王安石「新學」鼎足而三，共同構成了當時中國學術的三大主流。清代學者全祖望在《宋元學案》中專列「蘇氏蜀學略」，對其學術傳承與思想作了全面概述。宋代蜀學在經學方面還表現在蜀中《易》學的興盛，從漢嚴遵、揚雄以來，巴蜀學人重視《易》學，湧現出了如東晉蜀人范賢（蜀才）、北周蜀郡衛元嵩、唐代磐石李鼎祚、五

代宋初普州陳搏，宋代資州李石、陵州龍昌期、涪陵譙定、臨邛張成行等一批成就很高、對後世影響很大的《易》學家，尤其是陳搏的學術融儒、釋、道三教為一體，開啓宋代三教合一之先河。故宋代著名理學家程頤曾發出「《易》學在蜀耳，盍往求之」〔二九〕的感歎。宋代蜀學綿延兩百餘年，其源遠流長的學統，對宋代儒學各大流派以及後世中國文化史均產生了深遠影響。又如綿竹張栻是宋代著名理學大師，他在湖南主持嶽麓書院，開創了宋代理學的湖湘學派。而集宋代蜀學之大成的南宋理學大師蒲江魏了翁，世稱鶴山先生，一生著述宏富，「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始知義理之學」，弟子遍及天下，其創建的鶴山學派為宋代蜀學鼎盛作出了重要貢獻，故「南軒之教，遂大行於蜀中」〔三〇〕。其他宋代巴蜀著名經學家還有華陽范祖禹、涪陵崔子方、眉山王當、家鉉翁、宣化程公說、綿竹張浚、巴西趙鵬飛、井研李心傳等學者。當今著名學者蔡方鹿指出：「宋代巴蜀理學的興起既與整個宋代理學的產生與發展分不開，同時在蜀內外學者的學術交流中，也直接促進了宋代理學的發展……在這個過程中，張栻對理學的發展及對朱熹思想的刺激和啓發，魏了翁繼承朱熹和張栻，又會合蜀、洛，集宋代巴蜀理學之大成，都與當時理學、朱子學在全國和巴蜀的流傳影響分不開。」〔三一〕

唐宋時期，巴蜀文壇英才輩出，群星璀璨，名流競秀，佳作紛呈。唐代梓州陳子昂力改六朝綺靡纖弱之弊，詩風質樸明朗，格調蒼勁有力，標誌着初唐詩風的轉變。「詩仙」李白詩風豪放雄奇，清新俊逸，被公認為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浪漫主義詩人。而「唐宋八大家」中，蜀中蘇氏父子獨佔其三，而且「維子承父」〔三二〕，同出一門，蔚為中華學術史之奇觀。不僅如此，在古代文化發展鼎盛的唐宋時期，許多外籍詩人如王勃、盧照鄰、杜甫、岑參、白居易、劉禹錫、元稹、賈島、李商隱、韋莊、黃庭堅、陸游、范成大等紛紛入蜀，在蜀中留下了大量名篇佳作，故有「自古詩人例到蜀」的盛況。

宋代巴蜀史學撰述之隆，亦冠於宋世，故有「唐後莫隆於蜀」〔三三〕之說。當今史學大師鹽亭蒙文通指

出：「兩宋之世，史學特盛，超越漢唐。蜀中史著之多，方志之富，更為特出。」〔三四〕宋代巴蜀著名史學家有「華陽三范」，即參與編撰《新唐書》的范鎮，參與《資治通鑑》編纂、著有《唐鑒》的范祖禹，參與重修神宗、哲宗《實錄》的范沖。《唐鑒》被譽為「深明唐三百年治亂」的史學名著〔三五〕。眉州王偁所撰《東都事略》，被譽為「宋後史之最有法者」〔三六〕。丹棱李燾歷時四十年修成《續資治通鑑長編》，被譽為「春秋之後纔有此書」，是宋代繼司馬光之後最有成就的史學家。井研人李心傳著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其《朝野雜記》為「南渡以來野史之最詳者」，其「大綱細目，粲然悉備，為史家之巨擘」，「言宋事者，當必於是有徵焉」〔三七〕，他們都是當時第一流史學家，故近代學者雙流劉咸炘云：「蓋唐後史學莫隆於蜀，而匪特兩宋掌故之所存。」〔三八〕

儘管元代「蜀學微絕」〔三九〕，但仍出現了像仁壽虞集、虞槃、虞堪、井研牟巘、綿州鄧文原、遂寧謝端等文學家，雖然他們終生未在蜀地生活過，但他們的先輩卻是蜀人。各種史料記載往往標注其先世或籍貫為「蜀」，因宋末元初避亂江南，如虞集「祖籍仁壽」，「宋亡，僑居臨川崇仁」〔四〇〕，故不妨稱他們為蜀籍人士或蜀籍文學家〔四一〕。到明中葉以後，蜀學得以復興，如文史通才新都楊慎，雖一生坎坷，但著述豐富，多達四百餘種，其治學範圍廣泛，在整個明代，其「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為第一」〔四二〕。其所編纂的《全蜀藝文志》以及後人在此基礎上增補編纂而成的《補續全蜀藝文志》成為當今研究巴蜀歷史文化十分重要的文獻資料。在經學方面，明代著名《易》學家梁山來知德潛心研究《易》近三十年，所著《周易集解》成為後人研究《易》學的必讀之書，世稱「來氏易學」。而明末思想家達州唐甄所著《潛書》，批判封建專制，提倡社會平等，對近代社會啟蒙思潮產生了積極影響。

到了清代，尤其是清末民初，巴蜀文化又迎來了一次新的發展機遇。清康熙四十三年四川按察使劉德芳重建錦江書院，培育人才，其中最有成就的是綿州李調元，他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通才。清代中期，著